

论哈贝马斯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现象学视域

On the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abermas'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雷德鹏 /LEI Depeng 李霞丽 /LI Xiali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摘要: 哈贝马斯把现象学的“设计”和“兴趣”两个概念勾连起来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哲学视域, 以之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既严厉地批判了近代以来在技术认识兴趣导向下把自然视为“开采对象”的狭隘的科学主义意识, 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应当以解放认识兴趣为导向把自然设计为人类的“生存伙伴”的新见解, 从而构建起一种具有浓郁现象学气息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

关键词: 哈贝马斯 认识兴趣 人与自然关系 现象学

Abstract: Jürgen Habermas establishes a uniqu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by connecting the two concepts of “design” and “interest” in phenomenology, and then h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th it, not only criticizing severely the narrow consciousness of scientism that takes nature as an “exploitation obje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chnical cognitive interest in modern times, but also proposing creatively a new insight that takes nature as the “human survival partner” guided by liberating cognitive interest. As a result, he has established a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th a strong phenomenological flavor.

Key Words: Habermas; Cognitive interest; The rela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Phenomenology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2.08.005

一、问题的提出

有一种观点认为, 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那里, 自然的问题被置于思考的中心, 而这个问题到了哈贝马斯及其追随者这里却突然“消失了”(disappear)^[1]。笔者认为, 此说法是难以站得住脚的。因为, 虽然社会领域的问题始终处在哈贝马斯整个思想轨迹的轴心和焦点上, 但正如他自己所声称的, 自然(包括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乃是一个社会系统之不可或缺的环境要素, ([2], p.11) 因此, 他

的社会哲学便无法绕开这个话题。事实上, 哈贝马斯不仅在自己的一些著述中直接论及到了自然的问题, 并且在他看来, 与人前来照面的自然也不是那个朴素常识意义上的时间上在先、盲目的外在世界, 而是一个现象学意义上的世界概念。

从《逻辑研究》开始, “自然”(Nature)这个概念便经常出现在胡塞尔的讨论中。倪梁康指出, 胡塞尔从两个意义上使用“自然”这个概念: 一个意义上, 它涉及的是在先验生活中被构造的一个产物, 即由“自然经验”的意识活动所构造出的意向对象的相关项; 另一个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解释学视域下的后期胡塞尔现象学‘生活世界转向’研究”(项目编号: 21XZX022)。

收稿日期: 2021年5月26日

作者简介: 雷德鹏(1963-)男, 广西全州人,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现象学科技哲学、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等。Email: 2942229103@qq.com

李霞丽(1981-)女, 甘肃华亭人,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哲学。Email: 2289303605@qq.com

意义上是与先验生活的先验前史有关,即“自然的自在存在”,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物理自然”。^[3]方向红在一篇文章中也表达了相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胡塞尔的术语使用中,自然概念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世界意义上的自然,它是主体的兴趣和意志的构造物,一直都处于不断的生成和成长之中,即所谓“自然历史”;二是特指先行存在的“单纯的自然硬核(Kern)”,亦即意识构造活动的质素(Hyle)或原素(Urhyle)。^[4]据此,人们可以把胡塞尔早年和晚年分别批判心理主义的“意识自然化”、近代科学的“自然数学化”时所讨论的自然视为自在的“物理自然”,而把他批评近代科学暗中取代“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的“理念化了的自然”,([5], p.65)以及另一位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所说的科学的“世界图像”,^[6]便可以理解为意识生活的构造物,即主体意识对自然的设计。哈贝马斯在他的多部著作中阐释了与现象学极为相似的看法。

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认为,从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来看,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自然概念:一是所谓自在的自然界,即社会系统的环境的外在部分——外部自然或非人类环境中的物质资源;二是与人有关的自然,即社会系统的环境的内在部分——内在自然(人)或社会成员的有机基础。他还补充说,对于前者,社会系统在生产过程中用技术工具去占有之;而后者,社会系统则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用有效规范去占有之。([2], pp.11-12)在另一本书即《交往与社会进化》中,哈贝马斯也明确地区分了“外部自然”和“内在自然”。他说:“外在自然这个术语,我意指成年主体能够(尽管仅仅是间接地)感知、能够操纵并在现实中客观化了的那一部分。……我作为内在自然而加以分类的乃是全部欲望、感觉、意向等等”。^[7]其实,笔者发现,更早一些时候,即哈贝马斯于1968年在考察马克思的综合劳动概念时就已经做出了“作为人的主观自然”和“作为人的周围环境的客观自然”的区分,并强调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自然的本性。他说:“自此,‘自在的自然界’

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抽象物。但是,我们始终只是在人类历史形成过程的视野中看待自然界。”([8], p.29)易言之,我们尽管可以在认识论上把自然想象为一种抽象的自在之物,然而我们却只能在劳动过程所揭示的历史范围内才能真正认识自然界。所以,与人前来照面的自然,并不是那个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而是指已卷入到人类生活实践领域、受到人类劳动的改造并且烙上了社会-历史性印记的自然,即现象学的所谓“自然历史”的世界。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提出,在不同的认识兴趣支配下,同一的自然又往往被人们设计出迥然不同的形象,出现完全不同的对待自然的态度。由此而见,哈贝马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实际上包含着一个现象学式的视域问题。

二、借用现象学的“设计”和“兴趣”两个概念工具

首先,哈贝马斯批判地吸收了现象学的“设计”概念。

“设计”(Projekt,亦可译为“筹划”“谋划”等)一词,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中用得最多,萨特也特别青睐它。其实,这个词也是从胡塞尔现象学的“看”“构造”等概念转化而来的,用以描述历史活动主体的“给予意义”或“立义”的意向活动。

1968年,哈贝马斯在纪念马尔库塞诞辰七十周年的一篇题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文章中,专门提到了马尔库塞的“设计”以及“世界设计”概念。如所周知,马尔库塞是海德格尔的著名弟子,是一位典型的现象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曾借用恩师的“设计”这个词来描述历史实践的特殊本性。他认为,胡塞尔强调数学精确性和可替换性这些现代科学的中心观念,其实都是在“看”世界的特殊方式中建构起来的,而“看即是预期(Voraussehen),即是谋划(Vorhaben)。”([9], p.147)而实质上,由“看”而“构造”的观点正是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

一个显著特征。“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构造（constitution）扮演了一个中心的角色。”^[10]因此，马尔库塞觉得“谋划”一词非常切合于描述历史实践的实质。他说：“我之所以反复使用‘谋划’一词，是因为在我看来，它十分清楚地强调了历史实践的特殊性质。它产生于对理解、组织、超越现实的其他那些道路之一的决定性选择和捕捉。”（[9]，p.197）实质上，现象学的这个“设计”（或“谋划”）概念与现象学关于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理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现象学的观点看，自然只是一个可能性的东西（X），人们交往中所谈论的自然，实质上都是人们在历史的生活实践中运用了某些一般规定对之加以确定（解释、立义）的产物。因此，马尔库塞甚至宣称，现实、自然都是可能性的存在，它们最终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完全取决于主体的兴趣、欲望和想象。他说：“自然现在表现为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领域，本质上符合人类对美、和平和爱的需求。”^[11]哈贝马斯对此十分欣赏。他认为，在马尔库塞的这些论述中，“潜藏着一种由阶级利益和历史状况所决定的世界设计，即马尔库塞在谈到现象学家萨特时所说的那样一种‘设计’（Projekt）。”（[12]，p.43）事实上，这个概念也成为了哈贝马斯本人诠释社会历史活动的一个主要工具。

其次，哈贝马斯扬弃了现象学的“兴趣”概念。

1930年代，为了对当时人们谈论甚广的所谓“欧洲科学的危机”给出一个现象学的解释，晚年胡塞尔实现了先验现象学的所谓“历史转向”和“生活世界转向”，在历史沉思中探究古希腊人的理论兴趣（Interesse）、把理论态度与实践态度综合起来的兴趣，从生活世界的视角考察判断的前谓词经验起源的逻辑谱系学问题，兴趣、情绪等概念在他的这些研究中频繁出现，他的整个先验现象学面貌也焕然一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于这种情况，哈贝马斯这样描述道：“谁如果回想起三十年前的情况，想起那时出现的野蛮情景，谁就会尊重现象学描述所唤起的医治创伤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难以论证的。”（[12]，p.123）正是在

胡塞尔的影响下，哈贝马斯开始探究认识与兴趣的联系问题。他说：“我以胡塞尔大约那个时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为出发点”。（[12]，p.119）关于这里提到的胡塞尔那篇文章，哈贝马斯特别用一个注释加以指明，即胡塞尔的绝笔巨著《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12]，p.136）哈贝马斯在文中还表示，他自己不仅十分欣赏胡塞尔对科学的客观主义的严厉批评，即科学的客观主义把理论陈述中展示出来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完全等同于自在存在着的的东西而不谈这些陈述的意义在其中赖以形成的先验认识框架，而且还非常赞同胡塞尔关于撕破科学的客观主义的假象面纱的最好办法就是对被它所掩盖的东西——认识与兴趣的联系——给出的说明。“当然，正如胡塞尔进一步阐述的那样，客观主义不会被一种新的理论的力量所破坏，而只能被客观主义所掩盖的那种东西的说明所破坏：被认识和兴趣的联系的说明所破坏。”（[12]，pp.135-136）

在胡塞尔的基础上，哈贝马斯进一步阐发了一种社会哲学的“兴趣”概念，即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社会阶级利益甚至人类的整体利益的含义。第一，他把“兴趣”界定为“解决问题”的基本导向，认为它是人类自身形成、再生产的基本条件。（[8]，p.199）第二，他把兴趣区分为经验的兴趣和纯粹的兴趣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指解决满足感官问题的那些兴趣，后者指理性对美好事物的实践（道德）兴趣，即一种属于纯粹的乐趣。同时，哈贝马斯又把经验的兴趣区分为两种表现形式：即技术认识兴趣和实践认识兴趣。前者包含在经验—分析的科学（自然科学）的框架之中，即一种支配劳动或工具活动的兴趣，在这种兴趣下，人们试图通过科学预测对象的变化，通过技术掌握对象化过程，从而占有或支配外部世界；后者则是包含于历史—解释学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框架之中，即以流传下来的知识框架为背景，维护和扩大人类交往活动中的理解的“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ktivität）。至于纯粹的兴趣，哈贝马斯又称其为解放认识兴趣，即人类把自身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摆脱出来的反思自

身的解放运动。在科学归属上,它包含在“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哲学或认识批判)的框架之中。这样,哈贝马斯实际上从技术、实践和解放等三个维度对人类的认识兴趣做出了区分。第三,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兴趣”这个概念把人类的自然史与人类形成过程的逻辑相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的自然史亦即人类自我认同的逻辑,它体现为在技术、实践和解放三个维度的认识兴趣推动下人与自然关系的设计及其调整与更新的生动运动。

最后,哈贝马斯把现象学的“兴趣”和“设计”两个概念勾连起来而形成了一个考察现实(包括自然)的独特视域。

哈贝马斯提出,由技术、实践和解放三个维度所表征的这三种认识兴趣,它们分别构成了人类把握、理解现实的三种特殊观点。“只有用这些特殊的观点,我们才能理解现实本身。”([12], p.130)例如,在通过劳动促使人同外部自然相结合中,“现实是用技术观点来解释的”;而在通过批判的活动把对立的社会主体结合在一起中,“现实是用实践观点来解释的”。([8], p.49)就自然的话题来看,哈贝马斯认为,实践认识兴趣所指向的是社会系统这个“第二自然”。([13], p.512)无疑地,任何社会系统比如现代的社会制度,也是一个理性的人工设计的产物。^[14]不过,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并不是本文所关心的。因此,确切地说,哈贝马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中的“自然”概念,其所指即“第一自然”,即作为人和社会系统的周围环境的自然界。

接下来,本文着重阐述哈贝马斯关于技术认识兴趣和解放认识兴趣分别主导下的两种截然对立的人与自然关系范式理论及其现象学意蕴。

三、技术认识兴趣导向下人与自然关系范式的哲学批判及其现象学意蕴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或社会文化生活世界是一个大系统,包括了诸多子系统,而在近代

以来,社会系统中的所谓“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又被称为“劳动”亦即“工具活动”),却一枝独秀,日益占居了支配地位。譬如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人们对宇宙(其中包含着自然)的解释,是由神话、宗教和形而上学做出的;而自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以后,由于它允诺了一种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的新型制度,传统的社会制度框架便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了,对宇宙的解释使统治合法性的传统文明形式也“成为问题”。因此,正是由于日益膨胀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提供了根基。“资本主义提供的统治的合法性,不再是得自于文化传统的天国,而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12], p.54)而这里的所谓“社会劳动的根基”,无疑是指支配着“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技术力量。

哈贝马斯认为,从本质上说,工具的活动是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的;而技术规则,即基于经验知识对可以观察到的事件进行有条件的预测。因此,目的理性的活动就是要使确定的目标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因而其过程包括了以分析的知识为基础的按照战略进行的合理选择。也就是说,劳动或目的理性的(工具的和战略的)活动系统的指导规则包括技术规则和战略,它的有效性取决于经验上是真实的或分析上的正确性,其合理化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支配技术力量的扩大,即所谓“目的-手段-关系的合理性”;它的失败则会导致没有成果或恶劣的后果。不仅如此,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从社会的劳动领域向整个社会扩张并构成一种强大的压力,迫使每一个人不得不接受目的理性活动的价值取向。实际上,这个趋势与技术的目的理性活动同样地支配了现代科学的发展轨迹密不可分。因为自从伽利略以来,经验科学便是在一种“反映了可能用技术支配的先验观点”的坐标系中发展起来的。([12], p.57)易言之,近代以来一直盛行的所谓“经验科学”,实际上都是使用技术支配自然的结果。“在劳

动过程的先验联系中, 经验的组织和认识的客观性, 只有在使用技术去支配自然时才是可能的。” ([8], p.31)

哈贝马斯坦承, “现代科学的合理性是历史的产物这种见解, 既归功于马尔库塞, 同样也归功于胡塞尔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论述和海德格尔关于西方形而上学的瓦解的理论。” ([12], p.42) 笔者认为, 哈贝马斯的这个评价是十分公允的, 与事实吻合。因为马尔库塞曾指出, 自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以来, 技术本身已经异化为一种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 而只有在未来和平生存的社会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状况后, 科学才能获得根本不同的自然概念。而胡塞尔, 他是通过追溯伽利略新物理学原初意义的起源, 阐明了所谓现代科学的合理性实质上是一种单纯追求科学方法的理念化模型, 使科学技术化、形式化、游戏化、意义虚化, 其最终目的是在将自然数学化的过程中实现对自然的控制与统治。至于海德格尔, 他也曾尖锐地指出, 西方形而上学终结的产物即出现了现代科学, 而现代科学本质上是技术的, 是现代人类试图控制与统治自然的一种生存方式, 把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库”和“开采对象”, 即: “它在促逼意义上摆置自然”。 ([6], p.933)

与上述诸位现象学家一样, 哈贝马斯也说, 欧洲近代以来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出现了一种关于自然的技术解释模式。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 他认为欧洲近代以来发展出了一种以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生产方式, 形成了以“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为支配地位的社会系统和以“目的-手段-关系的合理性”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因此, 在目的理性活动的视野下, 自然被解释、设计为目的指向的领域, 亦即“用技术来支配的对象”, 或者说, “开采对象”。 ([12], p.45) 他说, 正是工具活动的条件, “把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 先验地、必然地同我们用可能的技术去支配自然过程的兴趣联系在一起。” ([8], p.30) 同时, 他还指出, 把自然解释、设计为技术支配的对象或开采对象, 这无疑是经验科学的理念框架所必然出现的结果。因为近代以来, 人们之所

以愿意花费大力气、大成本去发展科学, 无非是想通过科学的信息在技术上的使用以便更有力、更有效地支配、控制和统治自然。“人们从科学中学到支配[自然的]能力。” ([12], p.90) 后来, 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 哈贝马斯又把目的理性活动(劳动、工具活动)界定为以事态世界或客观世界为前提的目的论行动, 并且可以被描述为: 行动者通过选择一定的有效手段并以适当的方式运用这种手段而实现一种目的, 或者说, “促使一种所希望的状况出现”。 ([15], p.120) “按照这个模式所进行的行动是具有一种‘认识的意志的复合性’的, 因此, 这种行动, 一方面(通过知觉的中介)形成对存在的事态的意见, 另一方面, 可以阐发使期望的事态存在这种目的的意图。” ([15], p.123) 所以, 在目的论行动中, 客观世界即自然界被规定为行动者正面对的一个存在着的事态世界, 行动者按照自己的目的、期望和意图对其进行感知、论断、干预(开采)和改造。“行动者可以提出正确的或错误的论断, 并可以进行有目的的干预, 当然这种干预可能取得成就, 也可能失败, 就是说, 也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15], p.123)

海德格尔曾经一方面指出技术“摆置”“促逼”自然, 另一方面, 他又特别强调, 技术具有将一切固化的力量——所谓“座架”(Ge-stell), 同样也在摆置着人类自身。“‘座架’意味着对那种摆置(Stellen)的聚集, 这种摆置摆置着人, 也即促逼着人, 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 ([6], p.938) 马尔库塞在他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 更是生动地描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完全被扭曲了的现实状况: 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控制的新形式”, 它代替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功能, 统治一切, 最终造成了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 即: 社会、思想和人, 它们都成为了单向度的东西, 彻底地失去了其批判的维度。哈贝马斯也显然赞同这些观点, 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 科学变成了偶像, 技术变成了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 且较之旧的意识形态, 它更加令人难以抗拒。这就意味着, 工具理性所调节的主客体关系,

不仅仅决定着社会与外在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把这种关系延伸到社会内部,用哈贝马斯自己的话来说,即:“剥削客观自然的结构在社会内部又重新上演了一遍。”([13], p.369)因此,同海德格尔指明科学技术并非现代人类唯一、更非切近的生存方式一样,哈贝马斯也极力反对工具理性主义把自然界视为由技术来支配的对象或开采对象的解释模式。他援引黑格尔曾经批评工具主义的话说:工具主义者“抓住对象”的办法,好像是“带着刀剑棍棒去寻找真理”。([8], p.57)因此,在工具理性的暴力压制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体与自然的关系,必定遭到来自自然方面的激烈反抗。“而自然关系的反抗在社会及其成员的成长过程中是不断进行的。”([13], p.368)哈贝马斯还批评说,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实际上并不具有它所声称的所谓普遍性,相反地,它只有“一种特别有限的合理性”,甚至恰如马尔库塞所猛烈地批驳的,它的视野中展现出了一个悖论式的荒谬之物——“一个合理的极权的社会”。([12], p.42)哈贝马斯的最后结论是:在技术的认识兴趣导向下的自然解释范式,即把自然解释、设计为技术的开采对象,乃是一种虚幻的“狭隘的科学主义的意识”。([12], p.135)

四、解放认识兴趣导向下 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现象学维度

马尔库塞在引入“设计”(即“谋划”)一词时,他特别强调了这个词所包含着的积极意义。他说:“‘谋划’(project)一词强调在历史决定中自由和责任的因素,它把自主性和偶然事件联系起来。”([9], p.7)这或许正是哈贝马斯也尤其重视运用它来诠释自然的一个重要原因。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行动理论的视域下,自然界、社会和人,首先被理解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然后才能把自然解释为人类的生存伙伴。

哈贝马斯指出,在人类的交往行动中,实际上涉及到三个世界:一是存在着的事态的客观世界,包括作为人的本性的自然、人的周围

世界及其构成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二是社会世界,包括社会的规范系统、文化传统、制度框架等;三是主观世界,包括交往主体的内心世界、知识、情感和意志等。而由这三个世界一起从整体上构成了交往的“共同从属的关系体系”,因而这个事态的客观世界与单纯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界是有区别的。他说:“从根本上来说,只有通过这个关系体系我们才能理解事物。……发言者和听众所面临的是具有同样根源的三个世界的一个体系。”([15], p.119)也就是说,在交往行动中,自然界(存在着的事态的客观世界)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外在世界,而是与其他两个世界整个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同属于生活世界的关系体系,参与者只有借助于这个整体的关系体系才能理解所与之打交道的一切事物。换言之,生活世界作为一切交往行动的视野或背景,它与事态的客观世界(自然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交织在一起:交往行动的参与者在交往之前就预先拥有各自的主观世界(或内部世界),当交往一开始,它们就会发生相互碰撞、交流;与此同时,交往行动的参与者必定涉及到事态的客观世界(自然界)和社会世界,并在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过程中达成关于这两个世界的一些共识,即所谓交互主体性。由此可见,在生活世界的视野中,事态的客观世界与社会世界一样,也是交往活动中交往主体必定涉及到的、不可或缺的客观背景。

哈贝马斯的这些思想也烙上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明显印迹。确切地说,它们是具体运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和交互主体性理论的结果。关于前者,哈贝马斯自己直言不讳。他说:“我在这里不想使用胡塞尔的方法和他引入生活世界概念的语境,但我吸收了胡塞尔研究的核心内容。”([16], p.73)倪梁康指出,对“生活世界”问题的强调和发挥,可能是哈贝马斯“对胡塞尔现象学思想最确定的一个继承与发展点”。^[17]至于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理论,尽管哈贝马斯本人一再表示他不能接受胡塞尔的先验论的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甚至认为语言的交互主体性“构成了主体哲学的一个盲点”,

([16], p.75)“它仍然顽固地无视语言的交互主体性”“它的知识模型原则上是不能把握主体-主体关系”,^[18]等等。但是,他的这些批评却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扎哈维甚至用带有些许讥讽的口吻说,就要求先验哲学的交互主体性转折而论,“胡塞尔自己与阿佩尔(Karl Apel)和哈贝马斯是一致的”。^[19]

笔者认为,哈贝马斯提出从交往行动的交互主体性视野看自然,其最终目的是引向人类解放的认识兴趣,阐明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社会哲学观点。

众所周知,胡塞尔现象学还原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实现目光的转向,即把目光从外在对象返回“现象”——纯粹意识本身,从而摆脱实证主义的独断论态度。他称之为“认识批判”或“反思的哲学思维态度”。哈贝马斯则提出,自我反思能把主体从依赖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从而超越经验-分析的哲学态度。这与胡塞尔所倡导的哲学态度,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哈贝马斯明确说:“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同哲学一样都具有解放的认识兴趣。”([12], p.129)

那么,就哈贝马斯与胡塞尔所谈论的“解放”问题来说,他们实质上也别无二致。

胡塞尔在考察“欧洲科学的危机”时论及到哲学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他说:“哲学作为理论不仅解放研究者,而且解放任何受过哲学教育的人。……对于复活了的‘柏拉图主义’来说,这就意味着,不仅需要从伦理方面重新塑造自己,而且还需要从自由的理性,从普遍哲学的洞察出发,重新塑造人的整个环境,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存在。”([5], p.18)这里的哲学要“重新塑造人的整个环境”,无疑包括要重塑人的自然环境。对于胡塞尔的这种暗示,哈贝马斯自然心领神会。他提出,现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已经成为一种统治的力量,即成为了一种新的隐形的意识形态。在技术兴趣框架下,狭隘的科学主义意识业已设计和创立了一个控制的宇宙,其中也包括了对人的控制,因而不仅严重地损害了人类维护理解的交互主体性的兴趣,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

建立一种自由交往的解放兴趣。“技术统治的意识可以让这种实践兴趣消失在扩大我们的技术力量的兴趣后面。”([12], p.71)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人类要摆脱这个控制的宇宙,就必须进行一种政治上有效的反思,即把社会的技术潜能的实现置于社会的伦理规范、道德知识和正当意愿之下,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自由讨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他对此充满信心,认为这是“可以预测的”。([8], p.48)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来说,他提出,当代人类应当构建一种以解放的认识兴趣为导向的方法论框架,把自然解释、设计为一种全新的样式,即把它作为同人类相互作用的一方。“我们不把自然当作开采对象,而试图把它看作[生存]伙伴。”([12], p.45)哈贝马斯的这个思想,大体上包含了如下几层深刻的涵义:

首先,从交往的观点出发,把自然界解释为同我们交往的另一方。因此,必须摒弃狭隘的科学主义的意识,不能把自然设计为技术的开采对象。他说,正如马尔库塞和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所深刻地批判了的,技术的理性必定会给人类自身带来一种“设计者沉醉于他自身的设计的危险”。([12], p.137)

其次,说自然是人类的生存伙伴,即是说,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劳动系统中始终相伴着自然的因素和基础,并且,自然本身也在社会历史的劳动系统中得到展示和持存,两者形成统一性、相互依存。

最后,人与自然交往而形成统一性,并不意味着要抹煞作为交往另一方的自然界的独立性和外在性。哈贝马斯特别提醒人们,不能把社会中人际交往的关系机械地照搬到人与自然的交往上。因为自然界不可能像人世间的社会交往那样,在一种得到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在一种对正在交往的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的规范中,一方去适应另一方。“社会主体同自然界之间‘在工业中’建立的统一性,不可能消灭自然界的自律性以及与自然界的实在性联系在一起、残留的不可消除的异己性(die Fremdheit)。”([8], p.28)所以,人类应当尊重自然。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即人的解放。

哈贝马斯说,在尚未摆脱统治之前,人的被束缚着的主观性就不会得到解放。“只有当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往,并且每个人都能在别人身上来认识自己的时候,人类方能把自然界当作另外一个主体来认识。”([12], p.45)

综上所述,关于自然的认识,哈贝马斯不是从本体论(赋予自然优先性的方法),而是从建构论(赋予历史的人类世界优先性的方法)来讨论的,因此,诚如麦卡锡(Thomas McCarthy)所说的,在哈贝马斯这里,“作为一个整体,自然被解释为人类的建构”。^[2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哈贝马斯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学式视域,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印证了现象学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 [1] Feeberg, A. 'The Liberation of Nature?'[J]. *Western Humanities Review*, 2009, (Fall): 85-96.
- [2] 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M]. 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2009.
- [3] 倪梁康.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04.
- [4] 方向红. “自然历史”与“精神历史”——试析在胡塞尔手稿中的世界概念[J]. 哲学研究, 2013, (7): 86-94.
- [5] 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 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6]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下)[M]. 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 [7] 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M]. 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68.
- [8] 哈贝马斯. 认识与兴趣[M]. 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9]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 [10] Sokolowski, R. *The Formation of Husserl's Concept of Constitution*[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0, 195.
- [11] Feenberg, A. 'Marcuse: Reason, Imagination, and Utopia'[J]. *Radical Philosophy Review*, 2018, 21(2): 271-298.
- [12]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 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13]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精粹[M]. 曹卫东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4] 张庆熊. 哈贝马斯晚年的哲学思考和对当今世界焦点问题的回应[J]. 国外理论动态, 2019, (8): 5-13.
- [15] 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M]. 第1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 [16] 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M]. 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17] 倪梁康.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基于《生活世界》手稿的思考[J]. 哲学动态, 2019, (12): 58-66.
- [18] Zahavi, D. *Husserl and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A Response to the Linguistic-Pragmatic Critique*[M]. Behnke, E. A. (Tra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8.
- [19] D. 扎哈维. 胡塞尔先验哲学的交互主体性转折[J]. 臧佩洪译,哲学译丛, 2001, (4): 2-9.
- [20] 托马斯·麦卡锡.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M]. 王江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41.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